Globethics Repository



呂振中: 一位中文聖經翻譯家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Gàlik, Marian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11-12 15:09:0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74

吕振中:一位中文圣经翻译家

——献给苏黎世大学荣誉教授
罗伯特·P.克莱默斯,于其80寿辰之际

[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

内容提要:在苏黎世大学罗伯特·P.克莱默斯教授和香港圣经公会的支持下,由吕振中牧师翻译的圣经中文全译本于1970年问世,这使吕振中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将圣经翻译为白话文的中国人。尽管吕版圣经未达到教会权威们制定的翻译标准,但作为圣经中译史上的里程碑,它可以既用于教会内部也面向普罗大众。吕振中近三十年和克莱默斯十余年的共同努力没有白费。对于把福音传播给中国人这一普世事业来说,他们的硕果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值得称颂的贡献。

关键词:吕振中;圣经翻译;圣经中译本;白话文

LV Zhenzhong: On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of the Bible

Marián GÀLIK [Slovakia]
Trans. by LV Chong & LIU Yan

Abstract: One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whole Bible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by LV Zhenzhong was published in 1970 with the help of Zurich University's Prof. Robert P. Kramers and the Bible Society of Hong Kong. LV is the first translator of the whole Bible into the Chinese vernacular although this translation was not adequate to the standards of the Bible translating approved by authorities of the Churches. The translation can be used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hurches. And now LV' Bible translation becomes a milestone in Biblical scholarship. It is and will remain in the future a meritoriou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wide enterprise of spreading the Goods News to China.

Key words: LV Zhenzhong; Biblical translation;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Chinese vernacular

1970年,一个新的圣经中文全译本问世,其读者却极为有限。究其原因,不在于翻译质量的优劣,而是出自一个特别的事实:香港圣经公会(BSHK)投入了足够资金,仅以吕振中牧师及其亲友的名义出版此书。在扉页上我们可以读到:"为吕振中牧师出版。"①此版印数稀少,我承蒙罗伯特·P.克莱默斯(Robert P. Kramers)荣誉教授的好意得到一本,在此向他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克莱默斯教授还赠予我一些1954—1964年间的其他资料,在此期间,一些《旧约》部分的翻译草稿先后得到他及圣经公会代表们的商议,且于1963年4月8—14日召开以中文圣经修订为主题的翻译会议。他作为那次会议的组织者,以及香港和台湾圣经公会(BSHKT)的翻译顾问,对那部分的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60年代,欧洲传教士、中国神学家和宗教界人士渐渐发觉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圣经译本,吸收尤其是来自欧美权威

① 《圣经》(新译本),香港,1970年。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释经家和翻译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便更充分地彰显这部人类最具影响力的灵性之作。很多在此领域里甚为勤奋的中国新教徒不再满足于曾经最有影响力的中译本《新旧约全书》(上海：美国圣经公会[ABS]，大英海外圣经公会[BFBS]和苏格兰圣经公会[NBSS]，1919)。那本书的副标题是《官话和合本》(Mandarin Union Version)或《官话和合译本》(Translated Mandarin Union Version，UV)。那个译本由于采用现代汉语白话文形式而影响深远。尽管早在1906年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就提出过使用白话文，[①]但在1917年以前白话文一直未能取代古代汉语的文言文。1917年以后，胡适(1891—1962)倡导使用白话文，发动了新文化运动。[②]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也颁布一项新措施：从1920年秋季开始小学教学均使用白话文，以之取代文言文。[③]实属有趣的是：一本由中国人为顾问、外国人翻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成为了教科书，或许还是最重要的一本，帮助中国的孩子、年轻人和现代知识分子掌握了未来几十年里最规范的语言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文化工作者、政治家，甚至是后来那些参加反宗教运动(1922—1928)的人们，都曾阅读白话文的圣经及其福音书。[④]

① 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斯坦福，加州，1967年，第34页。

② 同上，第273-275页。

③ 同上，第279页。

④ 参见罗宾逊。又见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汪静之〈耶稣的吩咐〉：一部基督教小说?》，艾伯(Eber)编，第279-299页；马利安·高利克：《神话时代的勇士与致命的女性：茅盾版参孙与大利拉》(*Mythopoetic Warrior and Femme Fatale: Mao Dun's Version of Samson and Delilah*)，同上，第301-320页。此卷包含其他中文研究如梁工：《中国二十年圣经文学研究(1976-1996)》(*Twenty Years of Studies of Biblical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6-1996)*)，同上，第379-401页。比较同卷中马利安·高利克：《圣经、现代中国文学与跨文化交流》(*The Bibl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对这一问题还有其他一些书目，如刘易斯·史图尔特·罗宾逊(Lewis Stewart Robinson)的著作；此后为马佳(1995)和杨剑龙(1998)的著作。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1946和1947年，丹麦、英格兰、冰岛、荷兰、挪威、苏格兰、瑞典、瑞士以及美国的圣经公会开展了广泛合作，其间汇集许多人士，与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代表们形成了基督教界的“大都会”，中国汉语界也不例外。1946到1949年间，联合圣经公会(the Council of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UBS)的委员会成立了“翻译功能组”(Functional Group on Translation)，其主席为著名翻译理论家、圣经翻译权威尤金·A. 奈达(Eugene A. Nida)。①荷兰圣经公会(Netherlands's Bible Society，NBS)及其代表约翰·J. 柯金(John J. Kijine)给予奈达的工作以诸多支持。②或许正是由于柯金的介入，罗伯特·P. 克莱默斯成为荷兰圣经公会的代表，后又作为熟识中国哲学和语言的汉学家，担任了香港和台湾圣经公会的翻译顾问。奈达则是把圣经译成全世界多种语言的翻译项目的精神推动者。

在克莱默斯有意对圣经中文新译本——确切地说，是其部分译文——进行研讨后，便着手研究了奈达提出的方法体系。这项研究体现在其一篇题为《〈新约〉修订稿》(Revised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的论文中，主要讨论有关吕振中的福音书译文，该文由基督教文学所(Christian Literature Agency)于1952年出版。在研讨吕振中的译文期间(与香港圣经公会行政秘书道格拉斯·兰卡什尔[Douglas Lancashire]先生，以及吕牧师本人共同合作)，克莱默斯以奈达的《选文的译者评论》(*Translator's Commentary on the Selected Passages*，格兰岱尔，加州，1947)作为他(及其合作者)解读吕译本文本、释经、词汇以及句法的指南，发

① 参见E. M. 诺斯(E. M. North)：“尤金·A. 奈达”(*Eugene A. Nida: An Appreciation*)，载《论语言、文化和宗教》(*On Language,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Honour of Eugene A. Nida*)，马修·布莱克和威廉·A. 斯默里(Matthew Black, William A. Smalley)编，海牙-巴黎，1974年，页数不详。

② 同上。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表了一篇关于吕振中圣经修订版的文章。该文1954年10月首载于《圣经译者》(*The Bible Translator*),后重印其中文版,收录在贾保罗(即R. P. 克莱默斯)主编的《〈圣经〉汉译论文集》(香港,1965)中。[①]我不清楚克莱默斯是否读过奈达的另外一本书《〈圣经〉翻译:对地方语言翻译原则与步骤分析的特别指导》(*Bible Translating: An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boriginal Languages*,纽约,1947),该书侧重于分析"地方语言",其中提到中国一次。[②]然而,或许克莱默斯并不需要参考那本书,因为在召开上述会议时,他所采用的方法遵循了联合圣经公会的惯例,这在奈达的那本书中也有所体现。

对吕振中《旧约》翻译草稿的研讨大致始于1953年底,或1954年初。克莱默斯的档案文件现藏于我的图书室,其中第9—22页标记为"圣经研讨组",其工作开始于1954年3月15日,结束于1955年4月22日。但在克莱默斯给我的资料中,并没有任何1955年4月—1962年10月间的研讨记录。

1964年圣灵节前,克莱默斯在香港完成了另一篇重要论文:《中文〈圣经〉之修订——前途如何?》(What is the Future of the Bible Revisions in Chinese?)。[③]在文中,他总结了其十余年来在香港圣经协会(HKBS)及1953—1964年在香港和台湾圣经协会(HKTBS)的工作经验,此时他正欲动身前往瑞士接受苏黎世大学的教授职位。在本文结尾我会给予这一重要问题更多的关注。必须承认,克莱默斯的几乎所有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吕振中的工作息息相关。

吕振中(1898—1988)于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后在北京

① R. P. 克莱默斯(贾保罗):"评吕振中牧师新约新译修稿",《圣经汉译论文集》,第135-149页。

② 同上,第138页。

③ R. P. 克莱默斯:《圣经汉译论文集》,第150-160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的燕京大学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并在厦门的闽南神学院执教14年。[①]他的中文略带一些厦门口音。1940年，他受邀到燕京大学翻译《新约》。[②]其翻译的初稿1945年在私下悄悄发行，[③]1946年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正式出版。[④]他在纽约协和神学院（1947—1948）和英格兰威斯敏斯特学院（1948—1949）进一步进修圣经语言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翻译《旧约》。[⑤]美国人最先对这个"奇怪的人"产生兴趣，不过或许因为他个人的研究方向等原因，美国人并未更多地关注他。但大英海外圣经公会的态度却与此不同，特别是其代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Douglas Lancashire）先生，此人后来成为克莱默斯在香港的同事。以致无论经费还是在其他方面，吕振中都得到大英海外圣经公会的支持。吕振中和克莱默斯的合作开始于1953年，并且硕果累累。[⑥]

从英国回到香港后，吕振中不再积极参与教堂方面的事务。据其本人称，在1948至1973年4月担任神职期间，他只布道过两次。[⑦]这期间，香港大学名誉校长麦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将圣经翻译成汉语白话文的中国人，他接受了这一学位。主持人莱纳德·肯尼思·扬（Leonard Kenneth Young）教授在授予仪式上如此

---

① 参见L. K. 扬："荣誉学位授予大会，1973年4月12日周四"（Honorary Degrees Congregation, Thursday, 12th April, 1973），香港大学学报20（1973）4，第62页。

② 参见R. P. 克莱默斯："吕振中牧师圣经译文草稿记录"，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罗伯特·H. 伽斯曼（Robert H. Gassmann）：《秋水：马利安·高利克纪念文集》（*Autumn Floods: Essays in Honour of Marian Galik*），伯尔尼，1998年，第630页。

③ 同上。

④ 参见梁工等编：《圣经百科辞典》，沈阳，1990年，第477页。

⑤ "荣誉学位授予大会"，第62页。

⑥ 参见R. P. 克莱默斯："评吕振中牧师新约新译修稿"，第135页。

⑦ 参见L. K. 扬，同前引，第63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盛赞吕牧师：

> 只身深入古老过去，沿前人之路上下求索，思虑希腊与希伯来文之谜团。他单枪匹马，顽强战斗于翻译之战场，游历于语言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纷繁错乱之竞技场。……他弃绝感官享乐，笔耕不辍。在战争的喧嚣中，拖着病弱之躯，冲过重重危难。他似班扬笔下的基督徒，怀着无限的勇气和耐心，坚定地越过怀疑、沮丧与绝望之谷，这是每个学者在听到胜利号声，步入应许之地前所必须经历的。作为启示荣光的硕果，他以同时代的人们所能听懂和理解的语言，把所罗门之歌那慑人心魂的美和登山宝训的感人纯朴倾注到他们所熟悉的思想与词汇中去。

扬教授称："这部已付梓的著作成为了圣经翻译的里程碑。"[①]

罗伯特·克莱默斯在1962年10月与二十六位顾问的书信往来中，恳请他们阅读附于信中的《旧约》译稿并提出意见。[②]那些顾问来自香港、九龙、台湾、美国、英格兰、菲律宾、新加坡和沙捞越各神学院和其他机构。其中五位在规定的日期1963年1月31日之前未作出答复。寄出的译稿并非吕振中译的《旧约》全文，而仅是以下部分：《出埃及记》16-20章；《撒母耳记》1-21章；《诗篇》26篇、90-100篇；《约伯记》7-10章、《雅歌》1-4章、《箴言》8-9章、《以赛亚书》7-10章、《以西结书》1-3章。

克莱默斯希望顾问们提出的意见越详尽越好，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

①吕修订版文本与希伯来语圣经的关系，及其在当代圣经学

① 参见L. K. 扬，同前引，第63页。

② 所有关于吕振中牧师的信件和决定，以及他的回应和态度都根据R. P. 克莱默斯给我的资料，后不再重复出处。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术视野下的价值。

②鉴于吕的理解与广受欢迎的《和合本》中译者的理解有所不同,吕译本有何种价值。

③相比于《和合本》,吕译本中出现了很多不同于广为人知译本的圣经词汇,顾问们对此持何意见?

④在句法和风格方面,吕倾向于直译,并且尝试一种白话文的文风。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他正确吗?就后一个方面而言,他成功吗?

可以看出,这四方面与奈达在《选文的译者评论》中提出的四个要求正好相符。收到答复后,克莱默斯又于1963年2月写给顾问们(并满怀希望地寄出)另外一封信,题为《就吕振中牧师〈旧约〉译稿的询问》,很有可能他后来亲笔写下了那些最富代表性的意见。那封信包含了克莱默斯的全部问题以及顾问们的意见,鉴于引述信件全文过于冗长,我只选取其中最普遍的意见。

问:你认为吕牧师的译稿比教会现用的《和合本》更忠实地反映了原文吗?

答:总的来讲是这样的。

问:你认为吕牧师的译稿相比于《和合本》在表达上更准确吗?

答:不全是。

问:你认为现有的《和合本》亟待修订吗?

答:是的,肯定需要。

但对于此修订是"微小改动"还是"重新翻译",答案并不明确。对于"微小改动"是否"无甚价值",因而是否应该"重新翻译"的问题却没有回答。但对于"二者是否可能结合"的回答则是:"对于新译本,《和合本》倒是不错的参考资料之一。"

四位来自海外联合圣经公会的代表出席了1963年4月的会议,他们依次是:大英海外圣经公会的V. J. 布莱德诺克牧师(V. J.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Bradnock)、苏格兰圣经公会的D.麦克加文牧师(D. McGavin)、美国圣经公会的尤金·A. 奈达博士和荷兰圣经公会的J. L. 施威伦格莱贝尔博士(J. L. Swellengrebel)。根据克莱默斯的会议记录,除上述四位代表和克莱默斯外,吕振中与其他一些中国顾问也参加了讨论。其中在会上比较活跃的有:许牧士先生、Timothy Y. H. Chow博士、S. K. Leo牧师、刘翼凌先生、Philip C. H. Teng牧师,他们均来自香港和九龙。会议记录笔迹潦草,因此无法确定Fred C. C. Peng博士(美国)是否出席。

会后,W. J. 布莱德诺克撰写了《1963年4月香港中文圣经商议报告》,并分别寄给了奈达、麦克加文、施威伦格莱贝尔和克莱默斯。

这四位外国圣经公会的代表在"个人意见"中一方面称赞了吕振中,另一方面也给他致命一击。从布莱德诺克的信中可以看到如下意见:

①毫无疑问,没有人会认为这个译本能代替《和合本》。只有一两位顾问认为此译本为重译打下了基础。

②一致赞扬了吕振中在新译本中表现出的学术勤奋和执著精神。

③普遍认可了新译本中颇多的学术洞察,在这点上,新译本可以称得上是对圣经公会内任何有关《和合本》修订和新译工作的一大贡献。

④大部分顾问认为在语言风格和句法规范上,此译本不能由圣经公会出版。尽管如此,圣经公会的代表们和中国顾问们一致同意,"不管从哪方面看,此译本都是一大贡献"。

吕振中在对克莱默斯于1963年4月所作《吕振中牧师〈旧约〉翻译草稿问询报告》的反馈中,表达了谢意:

> 他精心设计了系统的调查问卷,投入诸多时间与精力,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井然有序地总结了批评和评论，指出了圣经翻译的相关及关键问题。但他仍存遗憾，尽管这个委托项目历时23年，由燕京大学发起，后由大英海外圣经协会接管，但在一片批评声中，它却如同一个巨大的错误和失败，浪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面对批评，吕振中在释经和文风方面为自己辩护：

> 上帝的启示不应仅为读书人显现（尽管这是其目的之一，或许还是最重要的），还应播撒其恩泽至孩童与百姓。人们不仅能在阅读中得启示，不可小视的是，也能借助于口耳相传，而简明的口语化圣经恰恰可以做到这点。

吕振中以武加大译本后来演变为不同版本的德语、英语等其他口语版圣经为例，承认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水平并不理想，但这个不足可以在将来的翻译过程中得到弥补。他希望“在对手稿进一步修订后”，其草稿（或许整本书，尽管他并未明确表示）可以供那些希望阅读和研究它的人使用。

但是，圣经公会代表们的决议比吕振中所预想的更为严格。此决议建议：

> 大英海外圣经公会以吕振中私人名义，资助出版并小规模印刷吕振中圣经试译本。
>
> 吕振中于1965年9月前提供一份完整的圣经全译本终稿。
>
> ——遵循通信中的全部意见以及克莱默斯长达95页的总结，显然过于繁冗，毫无必要。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在此，仅通过分析对《雅歌》译文的意见就足以说明问题，顾问们的十多条意见与此相关。但综观所有寄出的手稿，鲜有顾问对这部分译稿发表看法，或许是审阅吕振中译文的这些神学家们恰好对这部充满诗意、彰显两性爱情力量的作品不太感兴趣，且神学研究和关注的主要对象上帝也未在这部分中出现。在我看来，吕振中的《雅歌》译文很大程度上参考了1952年的《圣经修订标准版》(RSV)，其翻译是由"负责(早期版本)修订的三十二位学者完成的，并贯彻了由各合作教派五十位代表组成的顾问团的评审和建议"。[①]其中《雅歌》的翻译由美国犹太神学院的罗伯特·高狄斯(Robert Gordis)教授完成，随后于1954年与《雅歌》研究及评论一起单独出版。

对吕振中《雅歌》初稿前四章的意见参见克莱默斯的《吕振中牧师〈旧约〉译稿的讨论记录》(第1-30页和第33-95页)，《对第1-30页的更正和补充》(第31-32页)以及顾问通信的其他部分。译稿第一部分(第1-32页)于1963年圣诞节前夕完成，第二部分则在1964年4月完成。

无论是顾问还是克莱默斯或吕振中本人，通常都是将其译稿与《和合本》(UV)及《修订标准本》(RSV)进行比较。但在引述顾问们的褒贬及克莱默斯与吕振中的意见之前，请读者允许我再引用两个较早的《雅歌》版本，即由圣耶柔米(St. Jerome，约347—419年)翻译、于1592—1593年间修订的拉丁文《武加大版圣经》(Biblia Sacra Vulgatae Editionis，缩写为V)，[②]和英文《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Version，缩写为KJV，1611)，以及其他一些颇有意思的中译本。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那些版本的诗意和音韵。在我看来，翻译这枚世界爱情文学中的瑰宝，应以这两个方面为尺度。

① 《牛津圣经注释本与伪经：修订标准本》，纽约，1965年，页数不详。

② 这里为Valentinus Loch版，第二次印刷，雷根斯堡(Ratisbonae)，1863年。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雅歌》1:1(第一部分)

吕振中草稿:用他的口接吻亲我。

武加大译本:Osculetur me osculo oris sui.

钦定本:Let him kiss me with the kisses of his mouth.

和合本: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修订标准本:O that you would kiss me with the kisses of your mouth!

吕振中定稿:哦,愿他用他的亲嘴使我陶醉哦!

吕的草稿和定稿有很大不同。对比《修订标准本》,吕改变了代词,但这个改变实与希伯来文中的代词"他"而非"你"相符。不过,吕的译文过于繁冗随意。这一句最好的译文可能来自中国著名诗人陈梦家(1911—1966):"愿他用他的口与我接吻。"[①]其译文与《和合本》接近,且更有诗意。S. I. J. 施莱斯舍夫斯基(S. I. J. Schereschewsky)主教(1831—1906)的译文也与陈梦家类似:"惟愿与我接吻。"[②]

显然,"接吻"比起"亲嘴"更有诗意。后一个词在早期中文译本中"常以部分代表整体,象征着性交"。[③]

《雅歌》2:4

武加大译本:Introduxit me in cellam vinariam, ordinavit in me charitatem.

① 《歌中之歌》,上海,1932年,第12页。

② 《新旧约圣经》(浅文理),上海,1922年,第591页。艾伯(Eber)的《施莱斯舍夫斯基》是极好的关于其生平和论著的专著。

③ 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中国文化象征词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Symbols. Hidden Symbols in Chinese Life and Thought*),G.Y.康普贝尔(G.Y. Campbell)译自德文,台北,1994年,第156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钦定本:He brought me to the banqueting house, and his banner over me was love.

和合本: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

修订标准本:He brought me to the banqueting house, and his banner over me was love.

吕振中草稿:(资料中未给出全句的准确翻译。)

吕振中把"筵宴"改为"酒楼",略带现代餐馆或酒馆的意味,以致译文有些不太妥当。因此许牧世批评了吕振中的处理,但克莱默斯却认为其论点不太站得住脚,因为"酒楼"与希伯来文*beit hayayim*很接近。许牧世对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也不满意,认为"他的旗帜就只是爱,覆庇着我"太过生硬。吕振中接受了部分意见,但仍有所保留,其最终出版的定稿为:"他带领着我进了宴饮室,他的旗帜就只是'爱',覆庇着我。"尤为有趣的是,在所有圣经中译者中,希伯来圣经权威专家施莱斯舍夫斯基采用了最简洁且最富韵味的处理:"引导我入宴所,被我以宠爱。"

《雅歌》1:16

武加大译本:Ecce, tu pulcher es, dilecte mi, et docorus. Lectulus noster floridus.

钦定本:Behold, thou art fair, my beloved, yea pleasant: also our bed is green.

和合本:我的良人哪,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

克莱默斯认为"良人"这个词"有些过时,旧指丈夫"。吕的草稿则采用了"恋爱者"的译法,实际上他使用的是"爱人",被打字员错打为"恋爱者"。在出版的译本上,吕的翻译为:"哦,我的爱人哪,你很美丽!真可爱!啊,我们的床榻繁茂青葱。"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爱人”一词在中文中是有歧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爱人”常指丈夫。为避免误导读者，《和合本修订本》的编辑们在圣经（南京，1996）中仍保留了原来《和合本》中“良人”一词。最近的圣经（中英文对照，新国际版，香港-台北，1997）中仍沿用了此词。吕振中译文常被批评过于繁冗，以上就是一例。

《雅歌》2:1

武加大译本：Ego flos campi, et lilium convalium.

钦定本：I am the rose of Sharon, and the lily of the valleys.

和合本：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根据注释，“玫瑰”又译作“水仙花”。）

修订标准本：I am a rose of Sharon, a lily of the valleys.

修订标准本中另外注明“玫瑰”在希伯来文中也指“番红花”。吕在草稿中将“rose of Sharon”译为“平原上的番红花”，与下文“山谷中的百合花”对仗。其定稿为：“我，我是平原上的番红花，是山谷中的百合花。”陈梦家的版本要简练得多：“我是沙仑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这两个版本均符合古代希伯来文和现代中文的隐喻表达特点。而施莱斯舍夫斯基的译文则遵循了古诗中常用的“比喻”手法：“我如沙仑之玫瑰花，如谷中之百合花。”他认为“玫瑰”也能理解为“水仙花”。

从以上吕振中的译文可以看出，他偏爱对仗甚于音译，在这点上，他并没有成功地说服顾问们及后来的译者。顾问团中唯一的女性，芝加哥的弗吉尼亚·C. 李（Virginia C. Lee）在其信中批评道：“人称、地点等专有名词应与现有译本一致，若对专有名词另有理解可作注，或以插入语的形式予以解释。”这个批评对下一节也同样适用。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雅歌》2:10

武加大译本:En, dilectus meus loquitur mihi: Surge, propera, amica mea, Columba mea, Formosa mea, et veni.

钦定本:My beloved spake, and said unto me, Rise up, my love, my fait one and come away.

和合本: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修订标准本:My beloved speaks and says to me: Arise, my fair one, and come away.

关于这句吕振中的草稿到底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据许牧世称,"go with me"或"come away"被译为"来去吧",这似乎是厦门方言。他没有推荐更好的处理方法,不过吕振中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并在终稿中修改为:"我的爱人应时对我说,我的爱侶啊,起来吧!我的美人哪,走吧!"同样一句在《雅歌》2:13中再次重复。

《雅歌》2:17

武加大译本:donec aspiret dies. Et *inclinentur umbrae*. Revertere: similis esto, dilecte mi, capreae hinnloque cervorum super montes Bether.

钦定本:Until the day break, and the shadows flee away, turn, my beloved, and be thou like a roe or a young hart upon the mountains of Bether.

和合本:我的良人哪,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修订标准本:Until the day breathes and the shadows flee, turn, my beloved, be like a gazelle, or a young stag upon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rugged mountains.

按照弗吉尼亚·李的意见,"比特山"的翻译应与现有中文译文保持一致。但吕振中并未接受她的意见:"我的良人哪,求你来回跳跃,好比澄羚羊或小鹿仔在有裂罅的山岭上,直到天吹凉风,日影飞去时候。"

《南京本》和《新国际本(中文部分)》在这句上都逐字采用了《和合本》的译法。大英海外圣经公会的旧约顾问B. F. 普莱斯(B. F. Price)认为,"通过修改将两节联系在一起,这不论对于《和合本》还是《修订标准版》来说,都不啻为一大进步。"鉴于草稿措辞未知,我们很难衡量这个意见的价值,且普莱斯先生本人也承认他"没有能力评判中文风格"。

《雅歌》3:10和3:11

和合本:轿柱是用银作的,轿底是用金作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锡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婚筵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修订标准本:He made it [i.e., palanquin's] of silver, its back of gold, its seat of purple; it was lovingly wrought within by the daughters of Jerusalem. Go forth, O daughters of Zion, and behold King Solomon, with the crown with which his mother crowned him on the day of his wedding, on the day of the gladness of his heart.

注释指出,希伯来文中"it was lovingly wrought within"的含义并不明确。我们可以看到中译者严格遵循了《钦定本》: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e made the pillars thereof of silver, the bottom thereof of gold, the covering of it of purple, the midst thereof being paved with love, for the daughters of Jerusalem. Go forth. O ye daughters of Zion, and behold King Solomon with crown wherewith his mother crowned him in the day of his espousals, and in the day of the gladness of his heart.

吕的终稿如下：

他用银子作轿柱，用金子作轿靠子，用紫红色料作坐垫，内部装修的是皮。耶路撒冷的女子阿，你们要出去看所罗门王戴着冠冕，就是他结婚的日子，他心中喜乐时，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轿子不再是“用爱铺就”(《钦定本》及《和合本》)，也不是由“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铺”，而仅仅“内部装修的是皮”。即使是圣耶柔米的版本也更富于感官色彩：“media charitate constravit proper filias Jerusalem（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而施莱斯舍夫斯基的版本更加简洁并富有诗意：“内铺以文绣，式甚可爱。”这里“文绣”与孟子(前372-前289年)的“膏粱文绣”有关，喻指仁者不羡慕别人的奢华与享乐。[①]在我看来，最有表现力的仍数陈梦家的版本：“那紫金色的坐垫中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②]

很可能吕振中并未在1965年9月之前如期完成圣经的全部翻译。除了上述决议，圣经公会的代表们后来又决定：

① 参考刘殿爵(D. C. Lau)译：《孟子》，哈默德斯沃斯(Harmondsworth, 1970)，第169页，以及《孟子正义》，第23卷，《四部备要》，台北，1966年，第13页B。

② 陈梦家译，同前引，第27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①现在看来(在对吕振中进行"裁决"后)，目前似乎更需要一个全新的圣经中译本，而不仅仅是修订现有的国语本。

②目前能够承担这项工作的学者水平尚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深造。

③凡有志于完成学术深造，或希望在圣经翻译相关领域获得资格的青年学者，提议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每位学者的奖学金以两年为期限。

④推荐邀请以下人士作为此次"奖学金"项目的导师：

容启东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

周联华博士，台湾圣经学院(S. B. Seminary)院长；

吴德耀博士，东海大学校长；

黄彰辉博士，台湾台南神学院院长。

之后大概5—8年用于学习更深的背景知识，以及人员培训。至于这个项目的具体细节，包括计划、资金等，将在相关协会的年度企划会议上共同商议。

从R. P. 克莱默斯给我的资料上看不出这个项目的后续发展。克莱默斯在1962年6月2日写给B. F. 普莱斯的信中，提到"与苏黎世校方交涉"和他个人计划的变化，很可能正是此时或再稍晚些，他中止了作为吕振中翻译顾问的工作。

由此看出，联合圣经公会的代表们不仅对吕振中的翻译草稿不甚满意，而且认为汉语界以及年轻学生的圣经学术水平皆未达到其期望。

后来的《1965年1月中文磋商报告》(Chinese Consultation Report, January 1965)提到，该月E. A. 奈达与台湾圣经公会的赖炳炯初步商议，又与同为译者及评论家的周联华、顾敦蹂及台南神学院院长宋泉咸等人见面。[①]周联华、顾敦蹂和宋泉咸都是与

① 参见泽采(Zetzsche)，1999年，第347-348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克莱默斯共同审核吕振中翻译草稿的专家。[①]很可能上述负责"奖学金"项目的导师们的工作并不顺利。于是,这次他们认定"有限修改"(limited revision)《和合本》更为妥当,主要强调文风方面的修订(with principal emphasis on stylistic modification),[②]计划在5—6年内完成这一修订工作。

奈达与来自联合圣经公会的同事们对于整个项目的失败——至少是尚未取得成果——大概很失望。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才开始重新尝试修订《和合本》。其中一个修订本是《现代中文译本》(1980),许牧世和周联华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译本依据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完成,参考了1976年版的《福音圣经:现代英文本》(*Good News Bible: Today's English Version*),"被很多人誉为承继《和合本》的新版中文圣经"。[③]不过也有许多中文读者持强烈否定态度,他们仍坚持使用《和合本》。一系列会议于1983年和1984年8月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召开,会上提出修订的新标准,但直到最近修订工作才有新的进展。不过,也有一些稍作改动的《和合本修订本》在90年代问世,如《现代标点和合本》(香港,1993)。[④]我没有在1996年出版于南京的圣经里找到王神荫提议后的适当改动。[⑤]很可能中国新教圣经译者们从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就放弃了他们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后来他们甚至参与了联合圣经公会修订《和合本》的工作。[⑥]显然,那些中国人不愿同意奈达的观点:"没有哪种圣经译文能保持五十年后仍然适用(no Scripture is regarded as fully effective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⑦]

① 研讨吕振中草稿期间,这三位专家均与克莱默斯通过信。

② 泽采,1999年,第348页。

③ 同上,第350和416页。

④ 同上,第354-356页。

⑤ 同上,第357-359页。

⑥ 同上,第359页。

⑦ 尤金·A.奈达:"圣经翻译前沿"(*Bible Translation in Today's World*),《圣经译者》17(1966),第60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1963年复活节前一周，联合圣经公会的四位代表及其他顾问又召开一次会议。大约一年零一个月后，克莱默斯参照他有关中文圣经修订之未来前景的中文材料，写下他作为翻译顾问的最后一篇论文，那篇论文传达了他对中国基督徒的讯息，主要对象是工作在圣经领域的新教徒——不过我敢说同样也包括天主教徒，因为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另外一篇论文，其中强调了1961年在香港思高圣经学会的雷永明神父(Gabriele M. Allegra O. F. M.，1907—1976)领导下翻译的圣经中文本。他称之为一个“学术成就、宗教热诚的纪念碑”。①

克莱默斯认为，接受圣经修订和新译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新教徒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广为流传、大受好评的《和合本》，其中一些人已将其誉为与儒家经典、圣经原文，或中世纪及其后圣经经典译本同等地位的作品。很多人每日诵读，已成习惯。《和合本》不仅帮助他们形成了民族语言，而且还在塑造其内心灵性世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和合本》确是一部值得称颂的伟大作品，它参考了当时最完善的英译本，包括英文修订本(1881，1885，ERV)和美国修订本(1901，ARV)。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语言在不断变化，圣经研究也有了新进展，如此来看，拿出新的修订本或新译本已是迫不及待之事。

这一次，克莱默斯并未参照奈达在文本、释经、词法及句法方面有关圣经修订或翻译的要求，而是采用了严复(1853—1921)那众所周知的翻译标准“信、达、雅”。②顺便一提，严复也是文理(文言)版圣经的译者之一，他翻译了《马可福音》第1-4章，并“望国人能视圣经为经典”。③很遗憾这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伟大的

① R. P. 克莱默斯：“最近之中文《圣经》译本”，《圣经汉译论文集》，第33页。

② 参考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1984年，第136-138页。以及谢天振：《译介学》，上海，1999年，第65-67页。

③ 泽采，1999年，第130页。这里引自胡伯特·W. 斯皮勒特(Hubert W. Spillet)：《中国及其境内各语言圣经目录》(*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伦敦，1975年，第45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译者并未继续其圣经翻译。

对大多中国评论家来说,"信"是圣经翻译评判的一个重要维度。当然,对于文本所要传递的原始信息总是存有争议,但毕竟现在的视角相比于过去要进步。克莱默斯在此也间接指出了最近世界范围内圣经研究的不足。尽管一年前顾问团的宋泉咸教授肯定了吕振中在翻译中所投入的巨大精力与耐心,但他对吕振中是否参考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圣经注释:新旧约》(马丁·诺斯[Martin Noth]、诺伊基兴-弗林[Neukirchen-Vlyn]主编,1956)和《德语新旧约》(阿多·韦瑟[Arthur Weiser]、哥廷根[Göttingen]主编,1951—1983),仍表示怀疑。宋教授重点推荐了前一本书,因为它包含着"详尽的文本批评",而这恰恰是中译者的阿喀琉斯之踵。

对于其他评论家来说,则是如何在"达"与"雅"之间达成平衡。这两方面主要与翻译中涉及大量的文言词汇有关。从美学角度看,文言文较白话文的确更有价值,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不如后者那样通俗易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优美也是译文不可或缺的要求,因为不优美的文风有损于阅读的乐趣,甚至影响正确的理解。基于克莱默斯自己对保罗书信的经验,他认为翻译多个圣经版本以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是可能的。他承认自己理解圣保罗作品时遇到了困难,而J. B. 菲利浦(J. B. Phillip)那部极富争议的《致年轻教会:新约使徒书信的译本》(*Letters to Young Churches: A Transl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Epistles*,伦敦,1947)一书则帮助过他答疑解惑。①

在克莱默斯看来,"达"和"雅"固然重要,但对于圣经文本,"信"则尤为根本。"信"不同于"质"(字面翻译),后者不但含混不清,而且索然无味。他引用了孔子的话"文质彬彬",②认为这才是

① 参见冯铁对R. P. 克莱默斯论文的答复:"关于吕振中牧师圣经翻译草稿的笔记",冯铁-伽斯曼,同前引,第632页。

② 参考孔子:《论语》,刘殿爵译,香港,1979年,第50-51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文风与翻译的理想境界。

克莱默斯认为对于中译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渊博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知识,以及对圣经研究成果的广泛把握。时至20世纪60年代中叶,只有少数研究圣经的中国学生达到了这一水平,而克莱默斯认为吕振中牧师就是寥寥数人中的一个。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翻译完全达到了优雅完美。克莱默斯承认其译本在很多方面仍有欠缺,但吕振中坚持了"信"的原则,总体上,其文风更加贴近现代白话文。尽管吕振中的圣经译本未达到教会权威们所制定的翻译标准,但它可以既用于教会内部也面向普罗大众。

吕振中在其译本出版后写过一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他并未由于1964年联合圣经公会代表们的决定而感到冒犯。因为其他译者也曾面临过同样的命运。他提及其中两位:詹姆斯·默法特(James Moffatt)和埃德加·J. 古德斯毕德(Edgar J. Goodspeed)。①

罗伯特·P. 克莱默斯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努力协助推出一部能在中国新教教会内取代《和合本圣经》的中译本,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这当然不是他的过错。后来,据约斯特·O. 泽采(Jost O. Zetzsche)之见,②对于大多数中国新教徒来说,旧版或稍作修改的《和合本圣经》仍是"天经地义"的,是神谕(Verbi Divini)的不朽信使。

尽管如此,吕振中近三十年与克莱默斯十余年的共同努力并没有白费。对于把福音传播给中国人这一普世事业来说,他们的硕果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值得称颂的贡献。

(吕冲　刘燕 译)

① 吕振中:《有关于吕译圣经的问题》,第14页,未注标题和出版日期。

② 参见泽采,1999年,第345-361,369-370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马利安·高利克(Marián GÀLIK)是斯洛伐克科学院研究员,斯洛伐克共和国著名汉学家。主要著作有《茅盾与现代中国文学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等。本文选自其《影响、翻译和关联:〈圣经〉在中国》(*Influence, Translation and Parallels, Selected Studies on the Bible in China*),得到了作者的翻译授权。译者吕冲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研究生;刘燕是该校跨文化研究院教授。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